

发展观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是一个动人的字眼。人们常讲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与日俱增”,都是指的发展。

严格地讲,发展是指事物在规模、结构、程度和性质等方面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变化过程。没有从旧到新不是发展,没有从低到高也算不上发展。有发展就有个对发展的看法问题,这就叫发展观。古人的发展观,今天看来,无不是简单的、朴素的。

真正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那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工业文明观。简单地讲,就是“工业(经济)=发展”,这是现代发展观的第一阶段。现代发展观的第二阶段是 1973 年由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他们批判经济中心论,提出“经济+自然=发

展”。现代发展观的第三阶段就是前几年讲得比较多的可持续发展观,这就是“经济+自然+社会=发展”或者说再加个“时间”的维度。现代发展观的第四阶段由于多学科的介绍,提出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可是,人在这几个要件中并不十分突出。第五阶段的标志是 1995 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可以认为这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的最新阶段。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四个统一”:一是时间和空间统一,既要立体推进,又要持续推进;二是经济与社会统一,不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三是精神与物质统一,既不是“精神万能”,也不能搞

拜金主义,不能“有奶就是娘”;四是全面与重点统一,重点鲜明,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为圆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科学发展观堪称是发展观演化史上的最高阶段。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是有曲折的,认为只有升、没有降,发展的路径笔直而又笔直,是不现实的。

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量到质的转化。看到“质的转化”就要解放思想,大胆地突破旧质,走向新质。只在旧质的桎梏中讨生活,在陈规中求发展,是发展不到哪里去的。发展要有乘风破浪万里浪的无畏气概。

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只强调斗争性是不对的;不敢讲斗争,一味谈统一性也是掩耳盗铃。有斗争才需要协调,有统一说明

有可能协调。统一是目的,斗争是手段。古人都说“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管子·揆度》)领导者大治的本事就在一个“调”字上,既敢于“调”,又善于“调”。调好了,就是全面、可持续。

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要以人为本。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发展成果分享者。人人都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人心才有凝聚力,向心力,科学发展观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科学发展观认为具体事物的发展是有限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发展无止境。发展观要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对发展观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学习中继续加深,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摘自《人民网》)

“以人为本”的五大伦理意蕴

沈晓阳在《求实》2008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包含五大伦理要求:第一,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而言的,蕴涵着以物质利益原则为核心的世俗伦理要求。它要求我们从世俗伦理出发,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要关心和尊重他人的物质利益。第二,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而言的,蕴涵着以目的价值原则为核心的主体伦理要求。第三,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官为本而言的,蕴涵着以权力平等原则为核心的民主伦理要求。第四,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群为本而言的,蕴涵着以公平正义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伦理要求。第五,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自然为本而言的,蕴涵着以人类中心原则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放在一起,并不是一种自相矛盾,而是一种有机统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类为本,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为本,才能真正维护好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自《新华文摘》)



观点集锦

协商民主的价值

贾可卿在《人文杂志》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它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把协商主体从政治精英扩大到广大公民,有助于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在协商民主体制中,对共同关注事务的协商不再局限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普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在一些不够真实和健全的民主体制中,广大公民经常只是充当投票工具的角色,他们在政治机器的灌输、宣传下容易被操纵、被欺骗。而协商民主则更强调为不同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构建一个平台,保证人们进行商谈所必需的各项权利以及有效实现这些权利的所必需的权力。在这种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的基础上,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少数特权阶层和巨富阶层控制政治决策的现象。公民在协商过程中分享彼此的观点,分析彼此产生分歧的原因,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助于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改善决策的品质,促进社会和谐。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协商民主的根本精神。

当前文化资源开发的四点不足

杜超、王松华在《同济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国发展文

化产业的现实条件和比较优势。如何把这些资源用好,如何把静态、有限的资源势能转化为鲜活、无限的文化产业动能,这些问题历史和逻辑地成为时代课题。创新文化资源观,在深刻把握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不失为可行的求解方式。当前文化资源开发不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规划。表现在对资源的禀赋特征把握不够,对文化产业理解不深,跟着感觉走,跟着兴趣走或跟着别人走,忽视前期调研、论证和方案设计,草率或盲目上马,使资源的整体优势、核心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二是盲目开发。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转化为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也并非所有的开发都能实现预期。一般地,可度量文化资源更易于进入市场和进行产业开发,而不可度量文化资源难以转化为具体的包含着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三是粗放开发。由于对文化资源总体价值缺乏宏观深刻的把握,一些地方仓促上马,实施拼盘式、大杂烩式的低水平开发。四是无序开发。当前,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短期行为、单边行为和随心所欲的做法相当程度地存在着。

人的发展的含义和内容

李俊文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含义就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人的发展的含义决定了人的发展的内容。首先,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劳动的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形式的发展。作为类存在物,人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主体。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的本质特征。人只有通过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改造自身,在劳动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

人为满足需要有效地完成社会劳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本领。其次,人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的发展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中。马克思正是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最后人的发展实际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就是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自由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观

彭劲松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观是在社会主义利益观的基础上,体现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而形成的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型利益观。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坚持社会本位、人民本位的立场。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或者以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为本位,还是以社会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位,还是社会主义利益观与以往社会利益观的分水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本位、人民本位的立场,既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也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第二,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观应该体现和覆盖个人利益,尊重、保护和扩大个人利益,而不是否定和牺牲个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主体积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第三,确立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观,要求摒弃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注意社会利益结构的内在同一性,尽可能求同存异、增进共识,进一步维护公平正义,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第四,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宁夏“塞北江南”之称由来考

王培华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7 期撰文指出,宁夏何时获得“塞北江南”之称?从目前所见来看,专门研究西夏经济史的著作,受研究范围的限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汉唐时代,宁夏就出现了塞北江南的景象,过于宽泛;或者以为出自 10 世纪晚期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未必尽然。时至今日,弄清楚宁夏何时获得“塞北江南”之称、这个名称是如何发生、演变及其演变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其实,宁夏“塞北江南”之称,起于陈朝吴明彻残部被迁到灵州等地。北周宣政元年,江南俘虏 3 万余人,被安置在灵、盐、原地区从事农林牧盐业生产,这批人大约在隋开皇时被释放为良人,其崇礼好学的习俗才凸现出来。7 世纪初,即隋炀帝大业中期,郎茂撰著的《隋州郡图经》提出了灵州为塞北江南之说。9 世纪晚期,唐朝诗人韦蟾“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沿用了灵州为塞北江南之说,在传播宁夏为塞北江南的称誉中起了很大作用。明朝前期还有不少人把宁夏称为塞北江南。这其中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又有社会政策的因素,更有认识上的因素。

蹴鞠研究的主要结论

邵先锋在《管子学刊》撰文,总结了近年来蹴鞠研究的成果,指出,关于蹴鞠研究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中国蹴鞠起源于先秦齐国,临淄不仅是蹴鞠的发源地,也是流行地。现存的古籍记载可证。(二)从发展流行学的角度来说,古籍记载蹴鞠活动在战国时期已在临淄盛行,那么蹴鞠活动的起源就应早于盛行。因此,临淄的蹴鞠活动似应产生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但无文献可证。(三)鞠的制作技术的提高,使蹴鞠更加普及,不仅越来越规范化,而且越来越注重个人技法,越来越趋向于娱乐化。由于娱乐化消除了蹴鞠的对抗性,使得女子、儿童蹴鞠成为可能。女子蹴鞠自汉诞生后,唐宋达到鼎盛且历代流传,经久不衰。(四)无论蹴鞠如何发展演变,但各朝代将其作为士兵训练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没有变化,不同之处在于清代结合本民族文化特点,将陆地蹴鞠发展成为冰上蹴鞠。(五)蹴鞠是现代足球的雏形,鞠的形制与蹴鞠的规则都与现代足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足联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是有理有据的。

晋蒙粮油故道考

张世满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在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存在过一条地跨内蒙古和山西、水陆相接长达 2700 多华里的商品运输线,通过这条商路,大量产自内蒙古的粮食、油料、盐碱等日用物品顺着黄河输入山西北中部,这对于山西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条商道,可称之为晋蒙粮油故道。晋蒙粮油故道兴起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鼎盛于清光绪至民国初年,衰落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商道具有运输的季节性、货物流动的单向性、区域性以及各阶段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摘自《新华文摘》)